学术论坛

当代学者追求史学理论之芜滥

王尔敏

此处所谓之当代，其时限是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揭示新史学之后，以迄当今。梁启超只是开启史学上一个新时代契机，既无深入计划，亦无具体方法。所有新史学方向与内容之扩张俱是后来追随者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增饰润色。后人追究是轮不到梁启超负任何责任的。

我在此前已有三篇论文交代，新史学开启的主流思想和崭新内涵，是创造史学方法，为治史工作提出科学方法，并且高悬目标，想造出定理定律，公理公式。只是尚无人想到创造史学理论。也可以解释，其时不太分别理论是更较广大而全面的治史依据，直到抗战时期马列科学派史学理论出现。前此少有人谈及史学理论，自从五十年代（1950）以后，建造史学理论的新说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讨论，随之就纷纷展现。

马列科学派史家，倾向自创理论，但凡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以至自各样观点入手的史观与历史分期，均一一呈现。对此我是自始至今都不接受，但我不在此批评，是因为　耀东教授已早有研究专书问世。

原来掌握当代史学研究主流大宗与科学派史家，由于戒慎恐惧，不敢离开科学实证，更不敢高谈概括性的理论，这是十分谨慎也相当正确的科学精神。只是不能关门不理睬外界。于是一些研治中外关系史或西洋史的学者，在正宗主流之外，从事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史学界，藉朱家骅先生所创办的《大陆杂志》广泛介绍欧美新出的史学理论，其中尤以英国历史家陶恩培（Arnold J. Toynbee，后来多译称汤因比）《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成为最热门。在五十年代，史家学者频频介绍，学界颇为轰动。我正是大学生时代，阅读听讲最多，温熟了陶恩培的挑战与回应理论，十分倾信钦服。一时讲演讨论陶恩培的重要学者有张贵永、沈刚伯、胡秋原等人。他们的文章我是精细详读。陶恩培的理论影响到我研治近代史的多数论文。此一时期我们史学界领导人，决无任何勇气与意图要自创理论，我当时所见所闻，这批正宗科学派史家前辈们，实未尝提出自创理论的高见，他们的戒慎恐惧，坚持科学精神，也是可以在此记注令后世知晓。（如果有人不同意，请他公开提示反证。）

前述各节自是简明，且能代表我自己的认识。须知关于二十世纪之史学，我是后知后觉，前面早在 1987 年表达概观识见者已有唐德刚、王戎笙两位教授，嗣后又有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一书问世，他们各有表达也有评骘，我是不能重复他人的。就是最近的区志坚博士，他的文章也在我前面，也决不可抹杀。不过我得说只有唐德刚教授的讲演提到一点历史界创造理论的问题。虽然简单，却很明确。当然唐先生是最早检讨当代史学界创造理论问题的先驱。

[收稿日期] 2003- 7- 10
[作者简介] 王尔敏（1927—），男，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唐先生的讲演把当代史学分成三大流派，可使问题眉目清醒，使他的讲述便于发挥，海内尽知，我是绝对不用流派去讨论当代史学的人，但是唐先生的论断，我则是倾服接受。第一，他举实马列科学派史家所创的历史文化五段论，照抄其言，是：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五个历史段落。唐氏极具才识的加以详论，精辟透澈。他指出马列科学派史家把此理论当成金科玉律，所有著述都要填表似的对其各阶段阐释证明，并且绝对拒斥任何不同的解说。我很降服唐氏的卓识。①

第二，唐德刚先生把马列科学派史学以外的台、港、海外的史学家们一并合称之为：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这个标示我是全不同意，但是尊重唐氏的学术自由。主要是置五色迷离各形各色的学者于一炉，集假洋鬼子真土包子于一堂，大家各自高傲自视，谁能认同他人是自己一派，这就是我不按流派分类的理由。虽然，我仍是佩服唐氏的圆熟识见。唐氏坦率说出那些大声强调科学治史的学者，既提不出任何理论，也想不出高明的方法。如果不附庸洋人，那堪称得起是什么流派。我也可以在此作注解。请问陈祚龙属什么流派？柳存仁属什么流派？彭泽周属什么流派？黄仁宇属什么流派？许冠三属什么流派？偻指不胜枚举。这样五湖四海八方九野的星散史家，无不遗世独立，孤芳自赏。其寂寥苦况令人悲从中来。唐先生也明白说各派之间“壁垒森严”、“老死不相往来”。②我相信海外史家之间，就是全面屈膝洋化，也不能看成一派，何况有太多抱道守器之士决不屈从洋人，是不可以一概置于一个肮脏阵营之下看成一个一致的史学流派，对于海外的高洁之士，是大不敬，我们决要避免科学一统天下太平的荒谬思想。做历史研究的人清楚知道没有那么一回子事。

流落海外分散各地的中国史家，坚苦卓绝，不忘研考中国历史文化，自有其坚贞抱负，独立精神，我在同情敬仰之外，决不乱拉他们凑数，把海外学者看成一体一系。唐德刚先生大而化之，太过乐观。

除了各地分散的学人之外，也可以看到较具规模的分流支系。自远不及马列科学派史家的一统局面，亦尚各自恢张一面独具立场的小型格局。自比较分散的学者，显见其鲜明的流派态势。

第一个最具势力的一支，是原先傅斯年所领导的古史与考古学派，三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代表史学龙头，是正宗科学派史学主流。其中出现不少硕学名家。我在先前一文中，列举二十世纪先驱权威史家，载列这一流派有七位之多，足以代表学术重镇。(是即傅斯年、董作宾、陈　、劳　、严耕望、姚从吾、全汉　等人)③在那一个时段，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不过这一学派，形成科学信仰，谨守科学立场，绝不涉谈理论和史观，亦严忌作历史解释。主要坚持立场的代表人物是傅斯年、劳　两位。他二人的观点意见我早在三十年前引举原文在拙著《史学方法》，严正批斥这两位前辈的错误。④当然我无须在此重引。须知一切史料定于史家的明识与需要，没有解释，史料亦见不出价值。殷商珍贵的甲骨，被人当成药材吃掉已三千年，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被史家看重。你有什么特权和药商争论，宣布这是史料，药商能领悟吗？若果看谁出钱最多，那真悲哀。因为史家有解释的能力，才可使天下心服。

学术大门尚无人有能力关闭，看看同行中杜维运教授所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他是动色相戒，禁忌历史解释吗？他为何不追随傅斯年、劳　的谆谆教导？⑤讲授史学方法学界中有两位专业名家，一位是杜维运教授，一位是许冠三教授。二人俱著有史学方法书。杜著是《史学方法论》⑥，在其书中有专章讨论历史解释，更且另又讨论史家想像问题。可见再亲近的后学也不会追从师长的错误。至于许冠三的大作是《史学与史学方法》二册⑦，许书不止要谈历史解释，更谈历史理论。请学界各派大可参考他二人之书取法取戒。我在此讲述史学界事实，不看重学派立场。

二十世纪新史学的开展，自然是科学派史学居主流地位，而且是笼罩全局。当然重要领导人是傅斯年承接。傅氏具有宽博学养，并具文化使命感，更难得者，他既长于领导推动学术发展，同时亦富于演化思维与勇迈的实践精神。真是科学主义时代一个强力领袖。

科学派史学的方向全定于傅斯年之手，并由他主导。我当简明写出，供世人参证。新方向的开拓完全追摹西方的汉学（Sinology）。直接确切证据，出于傅斯年亲口所言。他在抗战前告诉张贵永先生云：“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这段话为张贵永先生在民国四十一年（1952）所作纪念傅斯年逝世的文章：“兰克的生平与著作”大文中作了简短附白。⑧在此自无庸细究。而唐德刚先生的讲演亦提及汉学对我国史学的影响。近年大陆学者桑兵教授叙及其在中国国学的对比。⑨请检视学界言论。唐氏、桑氏二人之外，摸清汉学底细者就是本人，不客气说我是三十年前就已了然所谓 sinology 的全部内涵。这并非乱说，我在民国六十四年（1975）就已刊印拙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⑩。我要在此解说，傅斯年是有选择性的利用西方汉学的规模，对于内涵重点有取有舍。请参看拙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西方汉学所历二百年经理汉学内涵，最大重点在于中国文学，其次是哲学（古今百家），再次是史学，再次是宗教，再次是艺术。可以占其内涵百分之九五。对于这样次序，我负全责。傅斯年深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看重文学、哲学、宗教和艺术。西方汉学的最大特色和不同于中国学问的特别贡献是语言学。因为这是汉学家入门手段，不通中国语言，决难研治汉学，而傅斯年所引重者也就纳入了语言学。我在去年谈二十世纪史学一文中，已详记傅氏所受语言考证的影响。当其在领导组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更把考古和民族两门纳入。这就是傅斯年所范铸的科学派史学的学派规模。而今已是后继无人，不能再见当年盛况。如不同意，请各自发表高见，让后人了解更多。

第二，较小局面的声势，不能望科学派史学主流之项背，但却自具理想、立场、方向、与其人才阵容。局面虽小，不可忽略。列于第二项要记述的是坚守儒家门户保持传统治史的钱穆及其门人弟子。钱穆孤忠坚忍，在香港弹丸之地，自创新亚一个独立书院。网罗同道人才有牟宗三、唐君毅、张丕介、徐复观等。以延续中国传统史学为职志。其造就后辈人才有余秉权、余英时、孙国栋、何佑森、陈启云、吴森、罗球庆、　耀东、李杜、唐端正、苏庆彬、金中枢、罗炳绵等俱在文史哲上显露声名。尤以余英时教授，不但继承钱氏史学且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传授更多弟子。总体来看，这一家派并无刻意讲述史学理论之举。

第三，先而是文化学院后亦改名大学，其创始人张其昀是地理学界领袖，于民国二十三年与竺可桢、翁文灏、胡焕庸合力开创地理学会，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开路先驱。本来史地之门已是各自独立。但在学术史渊源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均开史地系。我为后生晚学，亦是史地系出身。故于张其昀之领导史地学术，毫不意外。张氏当然是硕学大师，且是近代地理学开山大师。只他好大喜功，广收并蓄，最为科学派史家所诟病，把他戏称是张天师，更是卑视其学派。张氏门下大弟子有宋　、程光裕皆长于宋史，兼及于历史地理与方志学。自与科学派史家泾渭分明。但其广为造就人才，亦不断召开学术会议，广为编著各类史书。科学派史家决不投畀一瞥，极轻藐之。但我辈若谈一代史学，岂可略而不论？又是何居心？这一学派，当然未尝提倡与自创史学理论，亦向无此类著作问世。

第四，在五十年代后期，由郭廷以先生开创建立近代史研究所，最初不足十位人力，在郭先生辛苦经营下，慢慢开拓出专治近代史的一批史家，在郭氏主持所务时期，全所研究人员不超过三十人。直到 1980 年代后，人事始再扩张，直到近时人员亦不过五十人，自起始以至今兹，一直维持一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重镇。留有全所三十年史和三十年大事纪以至近代史同仁著作目录，更可靠者是近代史所出版品目录。俱可备学界参酌评估，实较其他流派最能清楚估算其成就与贡献。我有专文介绍郭廷以先生主持时期的近代史所，于此自无须重复再谈。⑪不过在第一代第二代人员退休之后，当今第三代承当全局重心的近代史专任研究员，除了少数研治台湾史者已向外有所开展外，其余以明清以至民国史之研究者，计有十余位研究员，构成一个坚强阵容的研究群体。其中饱学广识，已具国际声名者有林满红、吕芳上、陈永发、张瑞德、朱　源、熊秉真等人。

这一个史学流派，与前述各流派稍有不同。创始人郭廷以先生向来以自由学风领导群体，亦不强调任何方法论，惟止勤于讲演，向同仁提示重大问题，也帮助每一个门人定出研究领域以至商定专书的内容。只是向来不提理论问题。

郭廷以先生并不反对史家研讨理论，过去无人谈及，我须为后世留下纪录。郭氏自己不提倡史学理论，却在一开始创所敦聘三位西洋史学史专家，都是专任研究员。一是张贵永先生，我在大学受他教《西洋现代史》全年六学分课。一位是陶振誉先生，我在大学受他教《西洋中古史》全年四学分。一位是杨绍震先生。这三位都向我们介绍西洋史学。张贵永、陶振誉两位老师都也曾代理过所长，在所中也有十年之久。最重要的是张贵永先生，他在所中向我们作多次讲演，评介各家史学理论。[12]可以举证的具体论题有：史学的涵义及其问题，史学的研究范围，史学方法纲要，历史与人文教育，陶恩培论文化的起源，西洋外交史研究，赫尔德（Herder）的历史思想，俄国在远东与中东的侵略政策（此讲约分三四次讲完），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的原则等等[13]。张先生之外则杨绍震先生亦作不少西洋史学之介绍，相信我和同辈俱已备受薰陶。我深信陶恩培的史学理论是广泛影响到我们同仁的研究近代史。我个人之研究近代工业之兵工业，研究近代思想，以至近代外交，大抵都循着西方的冲击和中国在当时的因应为探讨脉络。

远泊海外各洲的中国学者，不忘故国之思，在万千逆境中坚毅贞定，忍耐孤寂，各于中国史学传统文化埋首潜沉治学，精神志节，令人钦敬。其本志不肯随波逐流，岂可望其归于何一流派？我人研考史学，宜各重其贡献，必当尊重每人自由意志，并其独造成果。事实上多数是敬慎小心，不务矜夸。在此无法备举其人，在海外的所谓华籍汉学家，二十世纪中亦是硕学英彦难于数计，以在美洲者为最盛，其次为欧洲、澳洲。大致所知若洪业、袁同礼、房兆楹、邓嗣禹、杨联 、何炳棣、任以都、罗荣邦、李田意、刘子健、徐中约、刘广京、唐德刚、周策纵、余英时、薛君度、郑宪、张歆保、汪一驹、朱昌 、吴文津、张锺渊、黄仁宇等等。俱在美国，若是汇聚成流派，大陆、台湾两地俱不能及。尚有流寓欧洲、澳洲者，则有柳存仁、王赓武、骆惠敏、刘殿爵、张心沧、陈志让、郑德坤、陈祚龙、左景权、吴其昱、李治华、王家煜等。这无怪唐德刚教授把海外汉学家看成一个英彦群起的流派。在此我坦白承认，相信我所举一定有所漏失。他们抱道守器，辛苦治学，令人产生深澈敬意，不能不见贤思齐。不过总体而言，流寓海外的学人仍多不曾要自创史学理论，却是开拓不少历史解释。

史学界直到 1970 年代，都还不甚热中创造理论，介绍来的外国理论只有陶恩培的理论具博通特色。其他的有点像广告宣白，牧师讲道，大多是狗皮膏药，可惜遇到史学家没有发病的机会。

不过在史学界于 1960 年代以后，有人开始杜造理论。近代史方面我较熟悉。可举一二供学界估断。其一是薛君度撰写黄兴传，我们十分肯定黄氏开国功绩，是一代英雄伟人。薛氏著文却偏要把他和孙中山绑在一起，创出一个革命史上的双领袖制。对此一理论只有薛氏一人相信，学界全无共鸣，让他白费心机。其二是许冠三所创的“多元史络”，他的大文刊出，学界无一人从信，他在中文大学教书多年，也未见任何一个学生使用他的理论。其三是黄仁宇所提倡的“大历史”，他的眼光远大，立意甚善，只是“大历史”一词很不着边际。又似理论又似形容，我是一向主张处理重大问题，但我无法形容说这就是大历史。因为他是二十世纪之末提出来，迄今尚未见到有谁追摹，我看不乐观。

近一百多年来自梁启超起步的新史学时代，可谓学者大师不乏其人，超卓学识不乏其选。我们后辈多不能追上前人，他们岂无能力创造理论，还要留着空间等我们这一代人士一显身手？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前辈饱学多识，深知史学上创造理论之不易，勉强造出也是徒劳无功，同时更是徒乱人意，浪费自己心血，也使学界增加纷扰。

以二十世纪百年中统观中国史学界的理论创造，除了一个庞大的马列科学派所造史学理论是影响大陆全面史学界的文化发展五阶段。

其余不属这一派的史学家亦自名家辈出。我们且莫失望，我尚可写下简要纪录，保存一些足供世人参证的个别理论:

第一个是梁启超领导中国史学新的转向。他就把中国史的方向定出一个奔趋的目标，比之于“大历史”要具体得多。梁氏指出一个三段发展步骤，就是“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这样带领我们今后的历史研究，自无不与世界息息相关。[14]

第二个是傅斯年所陈说的夷夏东西说。这一说使混沌的上古史，受了五帝一统传承故说所蒙蔽者，一举而廓清上古实象。[15]

第三个是徐旭生（名炳昶）所解说的上古民族文化三集团说。这使夷夏东西说作了修正，而是少不了有个苗蛮集团，三支互相推移，造出远古历史。[16]

第四个是顾颉刚的疑古史学理论。他创说中国古史传说是层层累上递造而成，命之为“层累地造成的史观”。[17]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使古史传说愈晚出愈是完备，愈有体系。这个理论对于读史很有帮助。其实何止古史，眼前的现代史也可援用。例如“五四运动”这件大事，代表中国当代民族醒觉，反抗帝国主义者之怒吼，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是何等的愤励严正，同一年中孙中山就宣示肯定。可是不久的后来，就混入了科学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更要扩展到新人生观运动。一概被纳于五四运动以为内涵。既称五四运动，五四这一天，这一年之内有这些呼求吗？有这些言论吗？运用文人的附会解说，把五四运动弄得肥肥胖胖。正可使蟑螂臭虫藏身其中，吸取五四的汁液。而对抗外力侵略的民族正义之声反而黯然消迹，志士仁人无人理会。明白说这是杜造，这是篡夺。须知最早质疑五四运动的内涵和人物，是五十年前的梁实秋。在一次他的讲演中，我亲自听到他的讥讽。他说有些五四领袖记忆力太差，回想五四时期，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也忘记自己在做什么。这一语道破无耻文人的冒滥。我想正派的史家必须加以澄清，还其原貌。至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新人生观运动，无论如何伟大，俱可照其发生时际，各自研判。五四时期流血流汗，南北奔走，众民人士岂愿受人如此的摆布？儒生杜撰五帝传说，被今人揭发，大肆挞伐。而面对当前文人粉饰铺张五四运动，反而　目不见丘山，还谈什么科学治史？

第五个是郭沫若的殷人祀帝敬鬼，周人畏天重人的创说。此说自可澄清上古史上前后文化迁流的变化。[18]

第六个是陈寅恪在中古史上所提示的两个治史管钥，其一是定出了北周以至隋唐政治的关中本位政策。其二是隋唐士大夫的社会升降，他运用唐诗，使人看到隋唐人活跃真实生活。[19]

第七个是雷海宗所特创的中国历史两周论。请注意，这一理论不是讲述历史重演，我相信这才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上的重大理论。这个理论纯讲中国的二度再生。把中国历史以淝水之战画分为先后两周。这一阶段关系到前期历史绝续。其前代表一周，接近于消亡。经过淝水之战而后的中国史亦勉强为半壁天下而酝酿出隋唐的统一盛世。对日抗战的惨烈残酷之大难，远超过淝水之战，雷氏视为第二周之势将达于消亡。但不敢遽然说出中国历史文化再生的第三周。其意在言外，供我们揣想。[20]

雷海宗先生也讲历史重演，那是完全就世界历史而立言。他大胆称述希腊罗马是春秋时代，近世三百年的欧洲是战国时代。像这样的史家才真能令中外敬重。[21]

第八个是沙学浚所作历史重演的论文示范。至少有五篇重要论文，在学界表现了中国史上的历史重演。在此可举三篇：其一是“从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马”，一篇文章解透中国三千年历史剧变的原始推动力，见到农业民族所受草原民族的巨大冲击。其二是“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举出东晋之南渡，南宋之南渡与南明之南渡。反复重演国家丧乱，人民颠沛流离之历史，可谓是血泪织染，古今同悲。沙氏选题，真是超卓深入。其三是“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一篇文章概述前段周、秦、汉、唐内陆帝国之盛衰，以及后段辽、金、元、明、清海陆兼顾之帝国兴衰。俱见这两个不同阶段之历史重演。[22]

第九个是全汉　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把运河的经济动脉，作为维系隋唐大陆帝国之繁荣强大，以此繁密输转的水上交通，

自江南富裕之经济中心连系上军容盛大冠盖云集之政治中心，是全汉 掌握帝国历史演变的一个管钥。[23]是故接着就有吴缉华所撰写《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也是就明代南北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恃运河的联系，以维系其帝国的强大繁荣。可视为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一个共通理论。[24]

第十个是蒋廷黻所提中国近代化一个历史动向。他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也就是抗战初期，但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关键时机。因为我们要检验创说的真义与其重要性，在此必须引证其说原词。蒋氏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开宗明义提示：

>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方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25]

蒋氏此论是为中国近代民族因应世局提出一个通盘的历史动向，历史上的实情，中国前代先驱自1844年魏源撰著《海国图志》就已启步迈向近代化道路，当时所提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嗣后的踵武先驱，1860年代的冯桂芬提出：鉴诸国，师夷狄。以至同时曾国藩的向欧美访求“制器之器”。我在此郑重提示，中国近代工业化启步于1861－1863年之间，是容闳、曾国藩、李鸿章所标举的“访求制器之器”这一主题。[26]这可定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一个推动指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更后的张之洞、盛宣怀，其号称自强运动，方向亦全是走向近代化。嗣后，孙中山1912年的“全面利用外资政策”与1919年“实业建设计画”，也全是同一步度，迈向近代化。在蒋廷黻先生之同时是中国国民党的十年建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是周恩来的科技、工业、农业、军事等四个现代化。经过1980年邓小平的踵武继承，国家全面开放，江泽民的展开二十年经济发展之路，近代的成果已现出曙光，势必一日千里，追上世界潮流，快速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蒋廷黻之参透历史动力，令人敬服。

二十世纪史学界前辈创造史学上理论，显著的特色，是出于个人的卓识独创。前无因袭，亦非抄自洋人。自足代表学术精华。这样才配在史学界成为表率，受后人尊仰。在此只能暂举以上十位名家，足以代表这百年来的小量成绩，我们必须敬慎珍惜，不能妄自菲薄。

本文各项叙述，俱是大略点到，乃是史家规矩，然亦有若干处多费笔墨，自有用意。如前叙蒋廷黻则著墨较多。盖为我本行近代史前驱大师。他才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徽帜。吾师郭廷以先生在民国三十九年（1950）七月在《大陆杂志》刊布其大作“中国近代化的延误”[27]，表达其时代性检证历史轨辙，是从具体史实指明近代化之重要。像蒋、郭两位先生的卓越识见，都是早过五十年代，这二位先驱史家，自三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已是熟思中国近代化问题，我必须指出这是远远早过美国社会科学家在1960年代的烘抬近代化理论的风气。蒋廷黻是先知先觉，学界无知之徒，反而向洋人认宗祖牌，这不合史实，只看文化学术霸力。

至此自必须进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方向。1955年2月郭廷以先生受命开办近代史研究所，我们一开始的研治方向，因郭廷以先生教导启示，实一致用心于中国近代化史实之发掘探究。我们的著作都在六十年代刊布，可以覆按。这当早过美国学界之开辟近代化理论有十年之多。我郑重告知学界，在1950年以后的美国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学术主流，是研究中共的蹶起，研究中共势力集团的斗争，最热门的一个重心，则是人人都研究游击战历史，这才是他们看重的学术主流。虽然他们的理论书出来，立即被发现不符实用，可是没有一个学者羞愧自杀。他们另找出路，于是形成六十年代赶上近代化（Modenrnization）理论的热潮。

请弄清楚，研究中国现代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看家本领，我们有师承传授，来自于郭廷以先生的示教。我们之研究近代新工业，各有著作问世，均出版于六十年代，代表先驱实

践。我另有论文："现代化的时代意义及其精神基础"[28]发表于《大学杂志》，时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同门学长凭恃研究专长，在七十年代提出十人分投研究的中国的区域现代化计划。

我的这些提出区域现代化的同门学者，俱都是郭廷以先生入室弟子，备受郭夫子识赏，这是我认为的近代史学者名家的钢铁阵容。这在当时的第一流历史家以李国祁、张朋园两位推为主持领导，共事者尚有吕实强、王树槐、王萍、林明德、陈三井、赵中孚、张玉法、苏云峰八位。自 1972 年起，展开十年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他们所共同使用的理论，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现代化理论。他们清楚的对学界对后世宣示，是承受自 1960 年代起美国现代化理论所影响，随之步趋这一新理论而作笃实的近代史事研究。[29]这种观点，是反映当代美国学界理论对我们史学界的影响力之全面渗透，一切自美国 1960 年的观点做起。但完全数典忘祖，丝毫不提 1938 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也忘掉自己老师郭廷以在 1950 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化的延续"。我要问在 1935 至 1950 间那些煌煌巨制的近代化理论在那里呢？我在此记一笔，但是体谅他们的处境，在美国文化学术风靡世界之大势下，这种新潮的理论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只有顺应潮流大势，否则连研究资源也拿不到。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有趣。台湾的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要开办博士班，向教育部申请三次都不能获准，在最后一次申请计划中，列出要开讲近代化理论课，于是过关，奉准设立。而近代化理论课，被奉为唯一必修科目，是何等庄严典重？后来我在 1989 年到政大历史研究所兼课，知道此情，告诉他们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科学家群中，早已破产，前进的学者亦不再谈此调，你们这样做徒留笑柄。不久之后两年，政大就取消此课。

回头来我须充分肯定我的辛勤耕耘的同道学者，他们的研究，才是近代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有五种早已出版，另有五种未出版，但已完稿而保存在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30]其他学者做不到，只提出理论模式，鱼网造得不少，却没有一个人下水抓鱼，只有这十位近代史学者，是所见到的鱼货展示。可是美国社会科学家却大肆挑剔，竟然批评种种不是，却忘记他们是杜撰害人理论的蛋头（egg head）专家。

1960 年代，这些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现代化理论，是很具架构，很切乎需要，很具参考榜样，也很轰动一时。他们虽不是深入研究，却相信十分正确，绝对有用，因为有现成美国为证。他们列出理论的现代化模式（要证明现代化的条件)：第一是经济的高度发展。第二是高度开发的国家，主要条件是全盘工业化。第三是都市化。第四是全面的大众传播之完备。第五是大众参与，就是奉行民主政治。第六是人民识字率的提高。这是拿美国现状向世界提示的现代化理论之实践。我们的学界俱已奉为圭臬，视为至理不刊。不过在美国流行十年，很快就破产。大批社会科学家也就迅速丢弃，以免惹来同仁非笑，我在香港见闻甚多，假若你要奉承他是现代化理论家，他会掩耳而逃。可以不必细说了。

根本的质疑是这些蛋头学者想错了对象。像美国、英、法、德、意这些先进国都已现代化了，这是事实。却是不会创生现代化思想。用旧词汇说，现代化是落后国家的重要思想和严肃问题。是不可以用美国的模式比照要求落后国家的，就是因为一无所有，才会极想现代化。脚上还穿不起皮鞋，脑子里已产生现代化的动念。那些美国社会科学家的理论是自照镜子杜造的。全然是闭门造车，不符实际。我可严正的告诉学界，中国近代历史就是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必须严肃对待，用心研考，不可失职。须知现代化中国近代步履的艰难历程，不要以为只穿草鞋就不会成功，不会现代化。

还有一些矛盾难题，是那些蛋头学者在创造理论时想不到的，就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直是自上的官方所推动。自清季的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张之洞、盛宣怀，以至当代周恩来在七十年代所提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全面对外开放，都是自上至下的现代化运动，这个运动尚未结束。请今代史家多留意吧！那些蛋头学者竟然批评李国祁、张朋园的不是，倒也不知天高地厚。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尚须改弦易辙，严肃研究，否则你如何解释今

日中国的现况。须知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推动力，是史家必须面对的第一号大论题。若不研究便是失职。

多年所见，那些争着创造理论的学者，虽是猛勇赶上潮流，往往得意不久就要过时，若不连忙丢弃，必有盛名之累。比如在香港任教的刘兆佳博士，是位社会学博士。我与之同事，但不相知。在大陆上推行人民公社的盛行之际，引起他的研究兴趣，用尽心力、人力、物力和科学调查方法，大肆研究，最后在七十年代完成一部巨著并刊印问世，可惜人民公社不久却顿然裁销，全部寿终正寝。这本书已经销行海内外，决不赔本。只是他的高明理论，变成无用武之地。虽然空耗才智，尚不亏本，但却很累盛名。社会学家刘先生勤勉醇正，很得人缘，终于把这一公案草草埋葬。而今刘先生已是学界前辈领袖，更是香港政府首席顾问，很有地方声望。近日尚多次见到报上表露其对香港前途的高见。他真是一位福将，香港命运不像人民公社，抑且他又很受特首董建华依重，人民公社的种种解说，虽已完全白搭，却早已为人忘却。而今他自是身名俱泰。又在为香港命运，展现理论神机。

所谓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像近代世局之香港，虽是降为英国殖民地，而人才荟萃代有其人，不可偻计。单只香港中文大学一隅，亦有不少博学远识之士。说到这里要提到一位社会科学家杜祖诒先生，是教育学家留美博士，在美国任教多年。在中文大学任教育学院院长。他多年注意到社会科学界一个问题，可以说一些大师泰斗，包办理论权威，形成美国领先独占优势，决不容忍他人创造理论。即使落后国家借用他们的理论，他们少数人，也是大力批斥，多方挑剔。我这样说你不相信，可以邀请杜教授讲一讲。这是对大陆学界说。因为早在十余年前，杜教授已和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说明邀台北社会科学界到香港开会，就谈社会科学理论被包办的问题。吴大猷为此先在中央研究院召开谈话会研商合作开会之事。事有凑巧，我受近代史所所长之命要我替他出席，因是拿回一点资料。此会系当时的总干事后来的副院长李崇道先生主持，他是农学博士，长久任官于农复会，国内著名的养猪专家。邀来的有各大学教授，我看不太专心，我坦白说，有些人并不关心是什么问题，而是积极的表示兴趣，要把握着一次开会的机会。我中途退席，不再听闻，也绝未发言。后来如何也全不过问。杜教授提有几页说明。事关版权，我不能代他公开宣布。一切应请教杜先生，只是可以确知中央研究院应留有这些资料。

另有一个小小的边缘旁证，可以说来参考。我与前期人类学家唐美君博士并不相识，但因其夫人陈碧蓉女士是史学界前期学长，我在美国相见熟识，曾到其府上拜访，就得拜见唐教授。唐先生爽朗快谈，讲起美国的经验，说到在社会科学界有位剥皮教授，他讥讽的强调说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剥皮教授，是当年学界super star，虽是很有办法，但却要敬而远之。我生平中只和唐教授见过一面，但却长久记得他所作的警示。后来知道一些历史界的朋友追随剥皮教授做助手，大概是资源充足，但是工作多年他也毫不提及这些后生的名字。我的史界朋友大概被剥下一层皮才黯然离开。这是个国际名人；当然到过台湾，也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界的领袖，对他极尽巴结之能事，因为做得自然，外界人是看不出来的。总的来说，那些社会科学家杜撰一些滥理论，你只能代为宣传，贩卖洋货，可以得其青睐。像近代化那样拙劣的滥理论，在美国已站不住脚。我的朋友用来大做特做，他却指摘批斥，踩在脚下。我是非常肯定我的朋友们的成绩，大概目前只有这些“区域现代化”才是真正的学术成绩，此外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还只是陈说理论。

这些创造现代化理论的社会科学家，站在落后地区学者面前，是绝不服输，也不承认错误。这个现代化理论到了六十年代末已受到美国学者挑战。当然也是在美国破产，因为新的思想兴起，使他们不得不收下招牌，从此销声匿迹，不敢见人。想想在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对外开放，实行其现代化的新路，虽说是追随周恩来四个现代化，而实际是摸着石头过河。那里会向美国请教那些杜撰的现代化理论。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也决扯不上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说教。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那些社会科学家的现代化理论毫不相

干。请我们的学界用心思考吧!

想想这些学术权威，不肯用心细究落后国家历史文化，照着美国各方面造就的情势，炮制现代化理论蓝图，向世界推销，一切都像至理名言，岂肯轻易放弃？关门大吉？主要是在六十年代末期，有一个反省的新思想迅锐兴起，那就是生态环境论（ecological enviromnent）所引致的社会生态理论。像是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高度开发，就是对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原来就是极大罪恶，地球上的资源枯竭，将是不能避免的灾难。高度工业化，严重污染，也是致命灾难的来源。他们急急收棚，另选捷径保持令名。这事我在 1968－1969 年间正在美国见到。社会生态理论已开始萌芽。我的朋友近代史历史家张朋园、李国祁等却在 1972 年，展开中国现代化的庞大研究，且别笑他们不识时务。中国真正的现代化之路还在颠踬蹉跎中向前缓进，直到 1990 年代才奋力猛晋。这可使人知道张朋园、李国祁所作的研究，功不可没。且为一代先驱。那些创造近代化理论的大师权威，完全跌破眼镜，也不可能再拣回旧家当。

在此我郑重宣白一个必须辨识的观念。我与张朋园先生虽是同窗，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学问上彼此各异。我在此指出他把中国的现代化认为就是等同于西化。这个说法在一般人似是而非，在专门研究则是错误。我在此表述前代人的思想动向，简单说：清季自 1860 至 1900 年的士大夫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等人的思想，以至自强运动，兴办轮船、枪炮、开矿、铁路、电报、造船等工业化，俱不是要求西化，而是现代化。质言之，无论思想与行动决无意于西化。非常显著的界线，在 1900 年庚子拳变，引致八国联军入京。中国朝野自此信心崩溃，自卑心理加强，自此才迅速兴起西化思想。我对此负责的暴白，并指出严复、梁启超言论以为佐证。我作此论断，要充分负起学术责任。[31]

我愿在下面列述三点理论上的比较要点，以肯定我自己的论断：

第一，在设论领域言，现代化与西化不在一个相等层次。现代化全部宗旨内涵，在表现国家的发展动力。而西化则是仿行西洋全部文化成果。

第二，现代化是把握现在的有效追求锐变更新的未来。决无回顾。而西化则是上溯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力求其永恒造诣，以为仿效。

第三，现代化力求千变万化，毫不停歇，一路创新，一路淘汰，只要一时，不求永恒，西化则是追求西方美善，追求千年万世永恒造诣。

我追随中国现代化历史研究的 50 年代先驱郭廷以先生所学何事？早在三十五年前我已著论探讨。概括我的观点，可以开示如下：

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史实要从 1860 年算起。名义虽是自强运动，实质则是谋求中国的现代化。

其二，现代化运动，表现朝野一致全国一致努力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国家的富强。

其三，我在三十年前所拟作的现代化的定义是：对于世界上创新的制度与方法作有效的选择和利用。

其四，我所估定的现代化的精神基础是：1. 理性的精神。2. 宽容的精神。3. 开拓的精神。4. 求效的精神。[32]

我这样简单开列，不多费辞，省用纸张，以免有博士卖驴之嫌。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我是前驱，我的思想来历出自于一九三〇年代蒋廷黻的启示，所以我敢代这些朋友表达不平。不怕和名家过招。

再次郑重声明，凡要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自 1844 年林则徐、魏源两位先知论起。他们所主张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国开启了现代化方向。直到今日，中国仍须循此方向前进。不达目的不会终止。

其实最先进的经济大国，以财富物质标榜文化造诣，却也有猛锐过头之处。大足糟塌高度开发的美好声名。就是只有这些沃土会生出许多经济动物，全出于理论家想像之外，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顶尖企业大亨，他们都具有恐龙身材，推动巨大生产开发，不承认有永恒价值，把握当今的有效，追求未来的创新。昨日的产品，全当做垃圾处理。这样与

日俱增，如何处置大量垃圾。他们妙计是以邻为壑，把夕阳工业、污染工业完全输送到落后国家。既敦睦邦交，又不违背上帝。我们台湾有一个高污染工业，就是拆船工业，五十年来，号称巨擘，但是造成环境污染，千年无法消除。这也正是现代化成果。

很惭愧我这一生没有赶时髦追逐理论，也深明创造理论之不易。这得甘寂寞。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如果不能拿出理论骗人，什么研究资源也到不了手。自然有人更上一层，因为大谈理论而掌控研究资源。这一趋势愈是后期就愈为强烈。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这如同宗教符　。请你翻看这时期史学论著，那一种不托理论以自重。我看全是人工制造废纸，全然不能传之后世。

---

①唐德刚撰：〈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传记文学》，五十一卷四期，台北，1987 年刊，25- 28 页。

②同前注，直引唐氏形容之原辞。

③王尔敏撰：〈二十世纪之史学开拓与先驱史家〉，载《近代史中国》147 期，2002 年，5- 26 页。

④王尔敏著：《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7 年初版，191- 193 页。

⑤杜维运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1966 年出版。

⑥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 年初版。

⑦许冠三著：《史学与史学方法》，上下二册，香港龙门书店，1975 年新版。

⑧张贵永著：《张致远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7 年初版，124- 145 页，《兰克的生平与著作》，其文附白云：本文为纪念傅孟真先生而作，先生于抗战前语我：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

⑨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⑩王尔敏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 年出版。

⑪王尔敏撰：《郭廷以先生及其所创建之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写成，未刊。

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纪要》，台北，1984 年印。

⑬张致远著：《史学讲话》，台北，1952 年初版。又《张致远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7 年初版。

⑭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

⑮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全集》，台北，1953 年印。

⑯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60 年印。

⑰刘起　著：《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102- 113 页，“古史大论战——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⑱郭沫若著：《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 年印。

⑲王永兴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印，142—197 页。

⑳雷海宗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台北，里仁书局，1984 年印，137- 172 页，“中国文化的两周”。

㉑雷海宗著：《伯伦史学集》，天津，南开史学家论丛，北京，中华书局印，2002 年版，217- 222 页，“中外的春秋时代”。

㉒沙学浚著：《地理学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年初版，1996 年第三次印，77- 133 页。

㉓全汉　著：《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年印。

㉔吴缉华著：《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1 年印。

㉕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印。

㉖王尔敏著：《清季兵工业的兴起》，78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3 年印。

㉗郭廷以著：《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书局，1987 年初版，1990 年 2 次印刷。

㉘王尔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1969 年印，277- 282 页。

㉙张朋园撰〈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载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34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 9 月刊，68- 74 页。

㉚关于“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书，已出版者有王树槐的江苏省，张朋园的湖南省，苏云峰的湖北省，李国祁的闽、浙、台，张玉法的山东省。而其外五种亦早已交稿，并未印出。有吕实强的四川省，赵中孚的东三省，林明德的河北省，玉萍的广东省以及陈三井的上海市。

㉛王尔敏撰：〈近代中国之开明专制论与强人领袖之想望〉，《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全二册)，1998 年 5 月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567- 580 页。

㉜王尔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1969 年初版，277- 282 页。